

为什么要建设“中国城市科学”^{*}

马 娜 刘士林

摘 要 在世界城市化的整体背景下,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关键矛盾为对象,凝聚和集成各民族、各地区、各阶段的知识、方法、思想、理论和智慧,探讨和建立一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交叉学科——中国城市科学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美”和“自由”为灵魂的城市人文科学是核心结构,以“善”和“秩序”为主要内涵的城市社会科学是中层结构,而以“真”和“物质”为主体的城市自然科学则是表层结构。研究城市,就是研究人类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问题,建设中国城市科学,最核心的目的是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家利益、因应人民需要的系统解决方案。

关键词 城市科学 研究对象 基本构架

中图分类号 C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8)05-0082-07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8.05.011

作者简介 马娜,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上海 200240;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首席专家,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 200240

一、在中国,为什么要建设城市科学

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近二十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以2016年末近8亿多城镇常住人口、超过30个城市群(经济区)、7个国家级城市群、8个国家中心城市为代表,“城市中国”的主体框架初告竣工。但与此同时,在城市环境、住房、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日益突出的“城市病”,也在考验着由于规模扩张过快而难以正常运转的中国城市。对此,一般会有两种不同态度:一是“逆城市化”,把城市看作当今社会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寄希望于逃避城市获得慰藉与解脱。二是“直面现实”,以“先适应城市,再改造城市”为策略,目的是最终变成城市的主人。很显然,“逆城市化”此路不通,因为城市化不是一个局部事件,而是一个全球化、整体性的进程。一个人可

能不直接生活在城市,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无论他的衣食住行,还是文化教育卫生娱乐,实际上都不可能与城市绝缘。

但比起人口集聚有限、经济活动简单、社会关系淳朴的乡村,要想把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变成城市这个当代“利维坦”的主宰者,又谈何容易?要适应、改造城市,先要认识、把握城市。这就需要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概念、范畴、理论、方法和技术工具,而且它们还要符合人类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在传统的学科体系中,并没有一门相对独立完整、自成一家之言的城市科学,这就使得在研究城市或制定战略及政策时,人们只能借鉴和使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后的非系统性和不协调性,是我们在研究城市时很难形成共识和普遍意见,以及成为在制定城市政策时总是相互冲突或顾此失彼的根

^{*}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首批建设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10JBG011)暨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计划项目“加快发展大都市圈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源。由此提出了一个新的时代课题:为全面有效地应对城市化挑战,我们已到了必须建设一门城市科学的逻辑—历史节点。一如在传统农业社会,我们的先民建构了以文史哲为中心的古典学术体系,并以此成功回应了传统社会发展的种种挑战一样,在面临今天这个全新的城市世界时,我们当然有必要创设属于“城市中国”的知识、方法、理论与价值体系。

如果在“要不要建设”上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要建设“中国城市科学”?在一般人看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不高,现代城市化的历史很短,应对城市问题的经验和技巧不丰富,甚至我们的城市研究也落后于西方,有必要建吗?能建成吗?但我们以为,中国不仅要考虑建设城市科学,还要立场坚定地提出“建设中国城市科学”。

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巨大、强烈和持续的现实需要。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城市正处在从重“速度”向重“效率”、从重“规模”向重“内涵”、从“物的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从“经济型城市化”向“文化型城市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个过程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复杂,也没有可以借用的现成理论和模式。二是现有理论无法承担解释城市化现实的思想使命。受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当今中国“半城半乡”社会形态的制约,各种简朴的思维方式、固化的研究方法和总体上倾向于保守的价值观念,使我们的传统理论、学科与急剧变化的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脱节,在某些局部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对立。而现代以来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又过于专业化与精细化,容易陷入“就事论事”“自说自话”的自闭语境,无法有效解释在形态上以多元性和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当代城市世界。理论的贫困必然导致现实的贫困,不知道城市的明天是什么,在城市化进程中疲于奔命,已成为当代中华民族最大的生存苦恼。三是西方城市理论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经验的重大原则问题。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城市走了不少弯路,出了不少问题,这在深层折射出我们用来指导城市建设的观念、理论、标准是很有问题的。一般人只

知道批评某个理论或某个城市,但从深层次上看,这些观念、理论和标准主要是西方的舶来品,因此也可以说西方城市理论和方法本身就是中国城市发展理念和建设问题的源头,如果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阻止很多问题和闹剧的一再上演。在道路自觉已然十分明确并逐渐找回文化自信的当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中国城市化有自己独特的的问题、架构、需要和道路,不能机械借鉴和使用其他国家的城市理论与发展模式。

中国城市化和美国高科技是人类21世纪的两大问题,这是大家熟知和经常引用的一句话。但正如一部近现代史所昭示的,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城市化也同样如此。这就有必要在世界城市化的整体背景下,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关键矛盾为对象,同时以开放的思路 and 心态广泛吸收世界各民族和各地区的方法和理论,探讨和建立一门符合中国城市化实际需要的新型交叉学科——中国城市科学,在积极应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各种问题与挑战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城市发展战略与智力支持。

二、在当下,中国城市科学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城市科学研究显然不可事无巨细、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需要抓住重点和本质问题,因城施策、对症下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对此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由于国家发展所处的生态环境并不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战略机遇期内迅速形成科学的系统性的生存和发展的城市化策略。不同于欧美和拉美,中国城市化面对的是属于当代中华民族的问题、现实与挑战,建设中国城市科学,最核心的目的是为此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家利益、因应人民需要的系统解决方案。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在当下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四大关系、八大矛盾,它们也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的主题和重点领域。^①

“一客”与“一主”: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和文化价值的重建。在150多年前,中国农业文明与西

方工业文明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碰撞,晚清重臣李鸿章曾感慨说那是“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但如果从八九千年前开始的农业生产和村落定居生活方式看,城市化则堪称是中华民族“一万年以来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个进程来得如此迅猛,压力如此巨大,是对此曾欢欣鼓舞、一心“进城”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城市和乡村是两种差别很大的空间生产形态。对此马克思曾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都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②

“集中”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经济上,以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为主导机制的城市经济取代了传统分散、相对自由的小农生产,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却恶性损耗和严重污染了自然环境,使城市在可持续发展上难以为继;二是在文化上,以自然、血缘、乡土为基础的“通体社会”分崩离析,被互不认同、缺乏归属的“联组社会”^③所取代,新兴的现代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冲击、破坏了传统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社会、道德、信仰、心理等精神生态危机频发,城市人永远失去了作为自然之子的安宁与快乐。由此可知,客观方面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主体世界的文化与价值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在内外两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应成为中国城市科学在整体上重点关注的领域和问题。

“一老”与“一少”:人口城市化中的“老龄化”和“独生子女化”。人口和空间是城市化的两大基本问题。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除了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中国人口的结构性问题近年来日益凸显,其中最突出的是老龄化和独生子女问题。早在1997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就郑重提醒“铭记21世纪老龄化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对任何社会都是一项重大挑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以2000年为界标,中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高达1.3亿,这个比例占到我国总人口的10%以上,这同时也意味着我国自2000年开始就已迈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仅会直接改变劳动力结构,减少未来社会生产的主体数量,也会在整体

上影响到一个社会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公共服务、文化创新和城市活力等方面。这在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欧洲国家已敲响了警钟。

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一个“额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确立和实施,有效地延缓了人口的增长,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并明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但计划生育政策也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新问题,如出生人口的大幅度下降直接抬升了老年人口的占比,成为加速我国老龄化的重要推手;如在计划生育背景下形成的“421”三层次的家庭结构,破坏了中国人口在自然生育状态下的平衡和节奏;还有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社会化与人格养成问题,则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未来。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如同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负担之重,前所未有,中国城市科学必须把这“一老一少”作为研究重点,才能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找到真实的中国经验,形成应对中国城市化的理论话语和战略思路。

“一大”与“一小”:空间城市化中的“超级城市”与“县域城镇”。与两个世纪前英美城市化进程不同,我们把当今世界的城市化命名为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它是传统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升级版与当代形态,“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构成了推动这个进程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④它好的一面是“集中优势兵力”,可以迅速提升区域与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不好的一面是导致“一城独大”,使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在都市化进程中,人口和资源迅速向大城市集中,北上广深等巨型城市纷纷产生。目前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已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武汉、成都、苏州、保定、哈尔滨、石家庄等。其中,上海人口最多,2017年达到2418.3万人,北京其次,2017年为2170.7万人。两者都属于联合国公布的全球十大巨型城市。超级城市无节制地扩张和无规则地蔓延,导致了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房价上涨、公共服务不足等“大城市病”,超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不容乐观。

与超级城市人满为患、资源过剩、过度繁华相对应,我国众多县域城镇却深陷于数量多而规模小、产业弱又机会少的生存困顿中,在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严重不足,看不到未来的出路何在。以人口为例,据《2013 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显示,2012 年中小城市的城市化率仅为 35.1%,远低于 52.6% 的全国平均水平。^⑤人口不单是个数量概念,人是一切的中心,它的集聚和流动,也总是与资源、资金、生产、创造等紧紧捆绑在一起的。超级城市和县域城镇,这“一大”与“一小”的矛盾,深刻反映了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两极分化和亚健康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并特别强调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不均衡的“都市化进程”的后遗症。

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容易,人口和资源流动具有“马太效应”,城市越大功能越优,人口与资源的聚集度就越高,并相应产生更为强烈的吸引力。对此不能简单依靠或寄希望于市场机制的调节,而应从国家战略和城市安全的高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与规划,推进城市从“大的太大”“小的太小”转向“规模适度”“大小得体”。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协调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此,李克强总理已提出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关键是如何把这个基本原则的内涵阐释好,并通过好的制度与机制设计落实到城市建设中。

“一实”与“一虚”:城市群战略下的高铁网与互联网。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在消费社会背景下,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察古观今,科技发明与进步,始终是解决这个人类基本生存矛盾的抓手。在城市化进程中,基于现代高科技的信息通讯技术和交通运输工程,也为我们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提供了现实可能。为解决人口和资源的分布不均和聚集过度,《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城市群”在概念上和“单体城市”相对,通俗地说,与“以邻为壑”“同质竞争”的“单体城市”不同,“城市群”是一种区域内大中小城市和村镇

组团发展、互动共生的发展模式。关于中国的城市群,在理论上可追溯到 1976 年,当时美国学者戈特曼发表了《全球大都市带体系》,预言“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有可能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在实践上,最早可追溯到 1983 年 1 月姚依林副总理提出的《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初步设想》,这个长三角经济区在 1990 年代被称为“长三角城市群”。30 多年过去,目前我国城市群已超过 30 个,但实际建设效果并不理想,存在的共性问题可归纳为:定位与发展目标不明确、内部联系与分工协作程度不高、区域行政壁垒的体制机制障碍比较严重、区域一体化战略难以进入实际操作阶段。^⑥一言以蔽之,它们多是打着“城市群之名”而行的却是“单体城市之实”。

要改变这种“粗放型发展模式”,仅仅依赖政策、文件等纸面文章是不够的,当代飞速发展的高新科技,特别是在“虚”的方面的信息通讯技术和在“实”的方面的高速交通体系,对于打破行政壁垒,促进区域内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开发,并最终形成城市群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具有意想不到的巨大的神奇力量。

现代交通从一开始就是城市群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世界上第一个城市群波士沃施(Bos-Wash)有赖于长约 500 英里的美国高速公路 U. S. I 轴(axis)。如同一个社会需要每个个体分工合作一样,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每个城市,也都因为资源有限而必须通过融入更大的城市共同体,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在大家熟知的半小时都市圈、一小时都市圈及同城效应等,都是从“以时间置换空间”入手寻求解决城市资源不足的问题的。从西方看,高铁对中小城市发展有明显的带动作用。法兰克福与科隆的高铁连接了德国两个最大的经济区,其途经的蒙塔鲍尔和林堡都是小城市,但在高铁开通后,它们很快实现了 2.7% 的年经济增长率。这是由于它们与法兰克福和科隆有了更多联系,不仅促使居民增加,也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和商业活动。^⑦我国的高铁正在迎来建设高潮,很多“入网”的中小城市收益巨大。

当今世界又称媒介社会,媒介和政治、经济一

起,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三驾马车。过去人们之所以向往大都市,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摆脱小城市的封闭,享受大城市发达的公共服务和文化生活。而主要依赖现代通讯技术的媒介社会,真正突破了空间和城乡的隔断,原因就在于它搭建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信息高速路网”。这种“以数据替代实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城市化领域就是“智慧城市”。从2012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起,陆续出现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试点、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基于云计算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试点示范等各种智慧城市试点,涉及多个部委和600多个城市。智慧城市是以信息通信、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主要技术手段,涉及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智慧水务、智慧医疗、智慧城管、智慧政务等方面,它们有力地打破了各种“信息孤岛”和“阻碍”,有效地降低了城市和城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同时,通过统筹利用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改变过去城市以大拆大建为基本特征的“粗笨式增长”,真正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提高城镇建设水平”落到实处。

总之,现代交通和现代信息通讯技术通过“一实”“一虚”两种手段,极大地提升了人口、资源的合理配置水平,为大规模人居空间特别是城市群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从互联网和高铁网可以充分看出,城市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因此,如何以科技创新引领城市发展,同时以城市需求推进科技创新,也是中国城市科学开展文化和科技交叉研究的重点领域和问题。

三、顶层设计 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城市科学体系是什么?

顾名思义,城市科学是关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基本特征的科学理论体系。与创建其他新理论和新学科面临的问题一样,建构中国城市科学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中,是否真的存

在着某种可以发现和归纳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原则与规律?从西方过去的城市理论研究看,可以说主要存在着两种态度:一是“否定主义”的看法,认为人类无法把握城市特有的“无序的复杂性”,把城市治理称为是“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这就全面否认了人类建构城市科学理论的可能性。二是“肯定主义”的看法,如简·雅各布斯把城市理解为“互为关联组成一个有机整体”。^⑧而作为有机整体的城市则必有其共通性的特征、规律与本质,这也就意味着可以建构出“城市科学”来。进一步说,将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城市化的实际结合起来,也就可以建构具有中国经验基础、符合我国城市发展需要的科学理论来。

城市科学当然不是无本之木。对城市的思考和理论探索源远流长,自从有了城市,人类也就开始思索城市。但只有在城市像脱缰野马一样快速狂奔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具有较为成熟形态的城市理论才真正出现。比如从社会学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城市社会学,从经济学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城市经济学,从人类学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城市人类学等。此外,为了适应我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情况,一些传统学科在相互交叉中也形成了一批充满生命力的新兴学科,如文学学科与社会学交叉形成的都市文化学,美学与城市规划学交叉形成的城市美学,传播学和城市社会学交叉形成的城市传播学等。这说明经过200多年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和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市化探索,提出和建设中国城市科学体系的学术条件和社会土壤已基本成熟。以城市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with 学科框架建设为中心,不仅有助于推动这些相对分散的城市理论实现视界融合,也可以更好地满足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基于中国城市科学起步晚、对西方话语依赖较重的现状,我们在国内外率先提出“中国式城市化”理论^⑨,严格区分了它与欧美、拉美的城市理论在形态、功能与模式上的差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在逻辑上迥异于西方理论的假设和推理,在现实中也走出了一条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并到了该认真总结经验和确立发展自信的历史时刻。

在认真研究世界城市化与城市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科学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在顶层设计上,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为立足点,在深入研究不同城市理论话语的基础上,设计和建构一些具有基础性和综合性的新理论,如城市科学、城市生态科学、城市信息科学、城市交通科学、城市环境科学等,为各种综合性和交叉性城市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理论工具。二是在学术创新上,这主要是针对已有的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人类学等而言,这些理论已有百年或至少也有几十年的历史积累,并且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和问题得出的理论总结。由于当今世界的城市发展变化剧烈,其中一些知识和方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及时对这些传统学科进行知识更新和系统升级,可以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三是在理论规范上,这主要是针对近年来新出现的城市文化学、城市群理论、城市设计学、城市行政学、城市美学等而言,这些新理论尽管有强烈的现实需要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本身在基本范畴、研究对象和范围、方法论等方面还不够清晰,需要通过科学的研究和界定并进行梳理和规范,以促使它们健康成长和可持续发展。以上三个方面就是目前我们所能描述的中国城市科学的基本体系。

由于目前城市研究分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学科,这三大学科中的城市话语不仅分散、孤立,而且也彼此冲突,要实现有机融合决非易事。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必须确立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不可偏废的总体原则。即中国城市科学的基本框架,必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学科门类,它们分别研究城市的物质基础、制度文明和人文精神,缺失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科学体系。二是三大基础学科的层级关系。根据三大基础学科的知识属性和社会功能,可以得出它们的层级关系,即以“美”和“自由”为灵魂的城市人文科学是核心结构,以“善”和“秩序”为主要内涵的城市社会科学是中层结构,而以“真”和“物质”为主体的城市自然科学则是表层结构。而据此建构的中国城市科学体系,基本上可以涵盖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方

方面和种种需要。三是以人文科学为中心的知识建构和理论整合原则。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这是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和探索的终极目标,由此还可以确定一个知识整合和建构的基本原则和技术程序: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遇时,要确立以社会科学为主导的理论建构原则,因为后者决定着前者的目的;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遇时,要确立以人文科学为主导理论建构原则,因为只有人文科学才能揭示城市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人文科学在未来城市发展和城市理论体系必须优先考虑的原因。

展望未来,无论是社会和文化问题,还是生产与生活方式,城市注定是它们要集聚和交汇的核心。研究城市,就是研究人类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问题,城市科学,就是未来城市世界“哲学中的哲学”。这个时代已为中国城市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躬逢其时,我们应努力推进中国城市科学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在服务国家战略、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上做出和这个城市时代相匹配的努力与贡献。

注:

- ①刘士林《关于中国式城市化的若干问题与启蒙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页。
- ③康少邦、张宁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 ④刘士林《都市化进程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
- ⑤中小城市绿皮书《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2)——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 ⑥刘士林《我国城市群发展面临的挑战》,《人民日报》2013年7月14日。
- ⑦Toward an Americ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Policy Roundtable Report. Cambridge, MA: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the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a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4.
- ⑧【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页。
- ⑨刘士林《什么是中国式城市化》,《光明日报》2013年2月18日。

(责任编辑: 逍 遥)

Why Do We Need to Build Chinese Urban Science Discipline?

Ma Na & Liu Shilin

Abstract: Under the overall background of worldwide urbanization , it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a new interdisciplinary——China's urban science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holding fundamental problems and crucial contradictions during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the major object , consolidating and integrating theories , knowledge , methods , ideas , and wisdoms from all nations , regions in every period. The urban humanities with “the beautiful” and “freedom” as the soul is the core structure of this discipline , the urban social science with “the good” and “order” as the main connotation is its middle structure , and the urban natural science with “the true” and “material” as the main body is its surface structure. The study on city , is the study on the most basic and the uppermost problem of human. The core objective of building China's urban science , is to provide systemic solution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people's ne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urban science; study object; basic framework

(上接第 81 页)

Policy Design Theory: Revival , Obstacles and Development

Zhu Wei

Abstract: Policy design refers to the choice of appropriate policy tools to achieve a prudent policy objective. It not only refers to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ideas , but also content of the policy. After a promising beginning in the 1970s and 1980s , the field languished in the 1990s and 2000s. Early research focused on policy tools and implementation , but in the 1990s and 2000s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studies ignored these traditional design concerns. However , the simplified design rules and processes promoted by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thought have not been realized in the real world. Policy design therefore reignited the attention of policy researchers and is dubbed as the “new policy design”. It focuses on recent efforts in the policy sciences to reinvent , or more properly , “re-discover” the policy design orientation in light of these developments. The new design orientation emphasizes the theme of “tool box” or “tool mixes”. The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signer and the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al element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traditional design. However , the new design i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design theory , disproportionate policy response , and ignoring the role of individual policy actors in design. The revival of policy design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levels of research into a broader and deeper field.

Key words: policy design; policy kit; disproportionate policy response;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policy actors